

重庆市出版专项资金资助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Dans les rapides du Fleuve Bleue
Voyage de la première canonnière française sur le haut Yang-tse-kiang*

长江激流行

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 编

周 勇 程武彦 ◎ 丛书主编

〔法〕武尔士 ◎ 著

曹 娅 赵文希 ◎ 译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Dans les rapides du Fleuve Bleu
Voyage de la première canonnière française sur le haut Yang-tse-kiang

长江激流行

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 ◎ 编

周 勇 程武彦 ◎ 丛书主编

〔法〕武尔士 ◎ 著

曹 娅 赵文希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江激流行——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法]武尔士著;曹娅,赵文希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229-13119-7

I. ①长… II. ①武… ②曹… ③赵… III. ①游记—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0243号

长江激流行——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

CHANGJIANG JILIU XING——FAGUO PAOJIAN SHOUHANG

CHANGJIANG SHANGYOU

[法]武尔士 著 曹娅 赵文希 译

责任编辑:王 娟

责任校对:刘小燕

装帧设计:彭平欣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8 字数:238千

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119-7

定价:5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周 勇 程武彦

成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川平	艾智科	刘兴亮	刘德奉	张 波
张荣祥	李 波	李廷勇	何智亚	邹后曦
黄晓东	常云平	曾 超	蓝 勇	戴 伶

重庆史就是中国史、世界史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总序

周 勇

重庆，山环水绕、江峡相拥，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历史文化名城。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重庆也不例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西方列强以利炮坚船侵入中国，中国被迫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重庆之于沿海，晚半个世纪。

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南京条约》，西方列强强开广州、上海、福州、厦门、宁波为通商口岸，控制了中国的出海口岸；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西方强开天津、南京、汉口等 11 个通商口岸，其势力伸入长江流域中下游；随即剑指长江上游地区的四川、云南。

从 19 世纪 60 年代起，英国工商界不断催促其政府沿长江西进，把上溯重庆，强迫重庆开埠，进而夺取长江上游，作为开辟中国西部市场的首要目标。从 60—70 年代，英国外交官员、冒险家、企业家、海军小组等纷纷进入四川重庆，考察调研。1874 年夏，英、法洋行更雇用民船私载洋货上驶重庆，直接闯关。1876 年，英国借“马嘉理事件”，强迫中国签订《烟台条约》，英国取得“派员驻寓”重庆和宜昌开埠等特权；同时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先决条件——轮船上驶重庆，其最终迫使重庆开埠的计划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随后，历任英国驻重庆领事一面加紧调研，一面游说鼓动。此举直接催生了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建造轮船驶抵宜昌，迫使中国政府与英国再谈重庆开埠条件。1890 年 3 月 31 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英国

正式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此时，距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了50年。

重庆开埠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西方列强在中国长江上游取得的最西端的通商口岸，英国的得手意味着欧美列强在这一领域对中国特权的“一体均沾”。1896年，后起的东亚列强日本又通过《马关条约》强迫重庆对日开埠。重庆成为列强共同侵占的半殖民地，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开埠，也开启了中国西部地区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个进程中，活跃着一大批外国人的身影。其中以英国为最。从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就掀起了一股“游历”中国西部的热潮。尤其是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准许“洋人”进入中国内陆，更成为英、法、日、德等外国人踏入中国内地游历、考察、传教的保障与凭证。此后，大量英国人渡海远行，溯江而上，踏进这片少人涉足的陌生疆域。他们身份各异、目的多样，有的直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服务于国家对外扩张战略；有的探险、游历，间接地向世界传递出中国西部的社会信息。令人瞩目的是，他们将沿途的见闻诉诸笔端，回国后到处演讲，并以日记、游记或报告的形式出版发行，扩大影响，也为我们今日的学术研究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我从1979年起，开始系统地学习历史学，并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期间，读到不少洋人有关重庆的著作。如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威海卫副司法行政长官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又译为：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对川江航道、重庆煤矿、养蚕业、水利灌溉以及白蜡产业的考察；有英国记者、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美国地理学会会员丁乐梅（Edwin John Dingle，又译为：埃德温·约翰·丁格尔）对川江航道、入川陆路、四川人口、铁路、工商业以及新式教育等的综合考察；英国作家、探险家以及第一位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院士毕晓普女士（J.F.Bishop，F.R.G.S.），她对中国西部进行了历时15个月的实地考察，尤其对长江上游和重庆的山川风貌、人情风土、社会环境等，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说明，进而提出重庆是“中国西部的商贸首都、清帝国最繁忙的城市之一”，是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城市。尤其是有促成重

庆开埠并第一个带领轮船驶抵重庆的英国商人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Archibald John Little)，他留下了名篇《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晚清中国西部的贸易与旅行》(曾译为《长江三峡游记》或《扁舟过三峡》)，这是一部对中国西部社会经济考察备述无遗的作品。有日本外交官、著名汉学家竹添进一郎留下的《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记载了他在中国各地游历的见闻，印象最深刻的则是在四川重庆的“栈云”和“峡雨”。有英国派驻重庆领事官谢立山从重庆到中国西部地区的深入考察，留下的《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一时轰动，重庆乃至西南逐渐被西方人所熟知。有天主教川东教区法国传教士华芳济 (P.Francois Fleury) 留下的《我在四川被囚禁的经过》，详细记录了余栋臣起义过程中他被俘的经历。有法国海军上尉武尔士 (Emile Auguste Léon Hourst, 又译为：埃米尔·奥古斯特·莱昂·乌尔斯特) 留下的《长江激流行——武尔士上尉率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这是目前所见的，唯一的由法国人撰写的有关川江航行和重庆城市历史的著作。有天主教重庆教区大修院院长古洛东 (Gourdon) 撰写的《圣教入川记》，记述了明朝以来天主教进入四川和在四川的活动。还有英国的冒险旅行家托马斯·索恩维尔·库柏 (Thomas Thornville Cooper) 撰写的《蓄辮着袍的英国贸易先锋——溯长江而上的探索之旅》，他是西方最早一批敢于直面风险穿越中国腹地的旅行家之一，也是近代英国到西藏东部探寻商路的第一人，等等。

这其中，有三类史料的量是比较大的。

首先是围绕重庆开埠谈判的档案史料。重庆开埠共进行了三场谈判，一是 1875—1876 年，中英烟台谈判，最终以签订《烟台条约》而告终，规定了重庆开埠的前提条件。二是 1887 年开始的中英宜昌谈判。这场谈判的主题就是重庆开埠，谈了近 4 年，到 1890 年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三是 1895 年，中日马关谈判，签订了《马关条约》，重庆对日本开埠。1980 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这段历史时，所能依据的只有收录在《清季外交史料》之中的中国档案史料。近 40 年来，我们可以看到有关重庆开埠的史料大大地扩展了。首先是日本档案史料的公布。2001 年，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建成开放，公布了近代

以来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记录当中选出的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关系相关的资料。这些资料都是政府有关机构国立公文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的资料，相当丰富。里面不但有中日马关谈判关于重庆的史料，更有日本人打探到的中英两国在烟台、宜昌谈判中的重要情报。后者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其次是英国国家档案馆中有关中英谈判重庆开埠史料的解密。我曾两次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档案，收获极丰。那里保存着19世纪以来英国与中国交往的丰富档案，特别是1875—1876年中英烟台谈判、1887—1890年中英宜昌谈判中关于重庆开埠的原始文件，包括两国之间的历次照会、双方谈判代表给各自国家的报告、有关当事人留下的书信、签署条约的往来磋商函件，特别是《烟台条约》和《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正式文本，其详细、生动，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其中还包括中日马关谈判的记录抄件。日、英档案的披露，让我们完全回到了100多年前中英、中日关于重庆开埠谈判的历史现场，似乎还能感触到那段历史的温度。这无疑为我们在中国档案之外打开了一扇观察重庆近代历史的窗户，在近代历史大潮中的重庆开埠的历史就更加清晰和生动地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其次是重庆海关档案的使用。1980年，我开始研究重庆开埠时，得到我国经济史学科主要奠基者与创始人、海关史学家汤象龙先生的指导。他曾于20世纪30年代前往英法德学习研究经济史，搜集到1891年重庆开埠时的海关调查报告。先生无私地将其借我使用，我也从此开始运用旧中国海关档案来研究重庆开埠的历史。随后，我又有机会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同仁共同翻译整理了一批重庆海关报告。这是当时海关关员搜集到的各类情报，每月、每季、每年向总税务司和英驻渝领事呈报。以后形成惯例，每十年编制一份综合性报告。凡重庆地区鸦片、贸易、人口、科举、教育、地势、出产、民船、本国钱号钱庄、信局、都会、会馆、航业、税收、金融、财政、河道、邮局、电报、行政、谘议局、司法、警察、监狱、农业、矿山、制造业、市政、医院、物价、工资、陆海军、铁路、省议会、灾荒等，均在其中。即使四川省以及湖北、贵州、云南、西藏、甘肃、

陕西的有关内容也有不少。这些情报搜罗范围之广泛、内容之详尽、地域之宽广，令人惊叹，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些史料是中国的档案文献所不可替代的，极为宝贵。

再次是《华西教会新闻》的影印出版。《华西教会新闻》(The West China Missionary News)是西南地区最早以英文出版的近代期刊，也是近代四川办报时间最长的报刊之一。它于1899年2月创刊于重庆，1943年底停刊于成都，跨度长达45年。该刊旨在加强华西各教会传教士之间的联系，因此大量记载了当时教会，特别是华西的教会活动状况，同时也从教会的视角记录了那一时期重庆、四川的历史细节，在中国新闻史、出版史、宗教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013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将其影印出版，凡45卷。

这些宝贵的史料对我的历史研究曾产生了重要的作用。我深知其对于学术研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很早就有一个愿望，将这些珍贵档案史料整理出来、翻译出来，公开出版，为我们的城市留下一笔基础性的历史记录，也让更多的学者可以使用，这对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和城市文化的发掘弘扬都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初，重庆市委老领导孟广涵和家父创办了重庆市地方史资料组、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团结学界，扎扎实实地做重庆历史研究的基础建设。我们几个青年的提议立即得到他们的支持和鼓励。于是我和搭档刘景修整理翻译了一部分重庆海关档案，以《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1876—1949》为题，于1987年在母校四川大学的出版社出版。我也发动我的姐姐、爱人和朋友们来翻译这批资料。但是当时的改革措施就是要求出版社“自己找饭吃”，对此类学术价值极高，而市场效益平平的著作，没有谁愿意接手出版。这是凭一己、一会之力所不能克服的困难。翻译工作也就搁置下来了，甚为遗憾。随着自己年龄的增大，随着所带学生的增加和成长，我越发有了紧迫感。

2010年，重庆市政府设立政府资助出版的专项资金，这给那些社会效益很好，而市场平平的出版物提供了机会，出版了一批好书。2015年，重庆市文化委在规划“十三五”期间出版项目时，我提出了将我30多年来搜集到的，近代以来外国学者、作家、政治家、记者撰写的

有关重庆的著作翻译出版，从全球视野观察重庆，解读重庆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我的提议得到了项目评审专家的一致赞成，便由重庆市文化委列为重庆市“十三五”期间的出版规划项目。尽管这离我知道并接触这批史料快40年了，但40年的愿望终于可以实现了。

《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就是这个项目的出版物。它是近代重庆历史的原始记录，是城市文化的宝贵财富，更是我们今天用全球化视野研究重庆的独特史料。它告诉我们，重庆史就是中国史、就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和重庆都是一笔珍贵的遗产，值得倍加珍惜。

近40年前，我开始研究重庆史的时候，早已有西方人记录和研究上海历史的著作中译本出版，而重庆则一本没有。我希望能改变这种状态。今天，《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的出版表明，我们不但有了，而且是一批。作为这段历史的经历者、见证者，我是感到欣慰的。

回望来路，我们这一代学人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而进入城市史研究领域的，更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中逐步成长起来的。我们感恩这个伟大的时代，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没有机会来做这些事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是重庆学界改革开放40年的一项成果，也是我们向这个伟大节日的一份献礼。

集40年之经验，“为城市存史，为市民立言，为后代续传统，为国史添篇章”，已经成为我们的理念。城市史研究只有与城市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蓬勃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面向第二个40年，我们会不忘初心，继续为中国的城市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学术的支撑。

当此《全球视野下的近代重庆丛书》出版之际，我们以此告慰那些在我们学术成长的道路上提携、扶持、关心、爱护过我们的老前辈。更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建设城市文化，造福人民群众，嘉惠学人后人。

2018年7月1日

译者序

正如法国汉学家贾永吉 (Michel Cartier) 在利氏学社所出的《中国，在爱与恨之间》中所言，西方汉学研究的资料来源，醒目地标示着两股流向，一是自利玛窦以后的早期传教士对于东方中国的热爱、敬仰、歌颂和粉饰，二是自十八世纪中叶以后，纷至而来的欧洲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者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各种观察和记录，其中不乏厌憎、蔑视和贬斥之辞^①。

在这份名单上，有一个人物的身份甚为特殊——他就是武尔士，法国海军上尉。他所到达的地方对当时的西方人来说是为陌生的，这一地区就是长江上游 1901 年的中国重庆，是中国内地最早的开埠城市之一。

埃米尔·奥古斯特·莱昂·乌尔斯特 (Émile Auguste Léon Hourst, 1864/05/20—1940/01/24) 是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在现有的中文资料中，他均被称作虎尔斯特，然而在本书中，作者告诉我们，他有一个中文名字：武尔士，并引以为自豪。我们可以在原书封面上的醒目位置看到超大字体的这三个中文字。

他是这样解释这个名字的：“武，尔，士。按照中文发音，这几个字差不多跟我的名字 Hourst 发音相吻合。这是由在法国家喻户晓的陈季同将军给我起的名……‘武尔士’实际上的意思是‘武官和学者’，对于冒险家来说这倒是个漂亮的题铭。”所以在本书的翻译中，译者采

^① CARTIER Michel, *La Chine entre amour et haine*, Institut Ricci, Paris, Desclée de brouwer, 1998.

用了他的汉语名字。

武尔士的主要身份并不是一个作家，而是一个军人，一生获奖颇多，其领域涉及军队的、殖民事业的、科学的、地理的、文学的，等等。他的主要职业建树是领导了两次考察：其一是在尼日尔河，其二是在长江及其支流岷江。这些经历让他留下了三本书：《武尔士考察队：在尼日尔河上》（1897）、《武尔士考察队：在尼日尔河和图阿格雷人的土地上》（1897），以及《武尔士的第二支考察队：在蓝色江流的激流险滩上——武尔士上尉率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1904）。这让他荣获了法兰西学术院蒙蒂翁奖（le prix Montyon）。此次翻译的是第三本，并冠以《长江激流行——法国炮舰首航长江上游》的译名。

1904年，该书原著在法国问世，武尔士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这个地域的观察者进入公众视野。书籍的出版，引起轰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当时西方人的冒险热情、法国人对于东方的好奇心，当然还有法兰西祖国带给他们的荣誉感。但是，仔细阅读后，我们不难发现，与其说这是一部文学作品，更不如说它是一段史料，除了作者自己搞错的地方，以及一些局限于其时代和身份的主观评论之外，其事实陈述部分，与现有的汉语资料基本吻合，有一些资料，甚至对这段时期的川渝历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和资料补充。

二十世纪初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一方面，国家与国家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胜者为王的丛林规则依然甚嚣尘上，殖民帝国的海外扩张仍在继续，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法兰西仍视其海外殖民地的影响为强大国力的标志。但是，欧美各国间，已开始达成并遵守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外交契约。另一方面，海外贸易正在兴起，并在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无情碾压保守落后、止步不前的古老文明。

武尔士就是在这个时候，1901年，来到中国，驾驶他的法国炮舰“奥尔里”号和小艇“大江”号，在长江上游进行考察，其考察线路涉及长江上游宜昌—重庆段，金沙江宜宾—云南段，以及岷江宜宾—成都段，最后还在成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义和团运动。

作为作者和书中主要人物的武尔士，是一个非常立体和多面的形

象，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彰显他的汉语名字所蕴涵的意义：智勇双全。

首先，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冒险家和航海家。长江上游的险滩既是他的对手，又是他要征服的目标。他对于江流江水、地理地貌的描写非常细致，并且常常带着一种严谨的探究精神。正如原书的序言中于勒·勒麦特所言，“有些人不折不扣地为我们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地球的全貌，武尔士就是其中之一”。每一次航行都是精神、体力和智力的严峻考验，都需要有历经千辛万苦而百折不挠的勇气和意志。“他的泄滩之行即是一出感人的、又令人焦灼的戏剧，就如亲历了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一般。”他在船只装备和航行技术上的严谨和执着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航行每每险情迭出，需要有超人的毅力、冷静、经验和智慧，经过多次的努力和尝试，往往到了绝望的关头，才阴差阳错，重获生机。

对于长江及其支流，古人虽然留下了“风生洲渚锦帆开”“心忆平波绿一篙”等大量美好诗文，以及为数不多的航行图，但是从水文的角度讲，缺乏具体的距离、比例、方位等资料。1899年，本书中所提及的法国传教士蔡尚质所绘地图，由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发行，名为《扬子江上游地图集》；1901年，在本书作者指挥下，开始了长江上游的水文测绘工作，武尔士运用三角测绘法留下的水文图，是将现代技术运用于该水域地图绘制的早期尝试，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这无疑是一份更为详尽、严谨、有数据和比例支撑的珍贵资料；这一工作后由法国海军继续，历经十余年，编撰出《长江上游航道图》，出版后成为川江航运的通用版本；1920年，本书中重要人物蒲兰田绘制的《川江航运指南》，由上海总税务司出版后，立即成为川江航行必备^①。凡此种种，在川江航运制图方式的现代转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从本书的写作手法来看，很明显，诸多内容都来自其航行日志和任务报告，时间、地点、险滩、河道、涨水、退水、事故等都记录得真实可信。在本书中出现的大小两百多个地名里，大部分与险滩和航行经过的地点有关。百年沧桑，岁月流逝，某些地名已经无从考证，武尔士的记录无疑

^① 参见李鹏，《晚清民国川江航道图编绘的历史考察》，《学术研究》2015年第2期。

可以给我们提供不少有用的参考。

很有意思的是，武尔士的名字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但是他在重庆留下了一座遐迩闻名的建筑：法国水师兵营。虽然建筑即将完工之前他就回法国了，所以在他的自述中并没有出现这座建筑的名字，但是作者在很多地方都不厌其烦地讲述了修建的过程。最后，关于建筑物的方位、地址、质地、大小，甚至几栋、几层、几米的堡坎等等信息，在对照了当时的照片、附在书中的考察队员的现场素描，以及书中的文字描写后，发现所有描述与现存的法国水师兵营完全吻合。

其次，作为军人，他对法兰西祖国无比忠诚。在书中，武尔士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努力排除千难万险，为国争光的形象。这反映在除了对英国同行表示出礼节性的尊敬外，他从不放过任何机会跟英国人一争高下。他不厌其烦地叙述和表露对于英国人的嫉妒和嘲讽：自己是如何在装备和资料信息都完全落后于英国人的情况下，要让法国的船成为最先到达长江上游各重镇的外国炮舰；对于英国人抢先从清朝政府高官那里获得采矿权，他在愤懑之余不忘挖苦对方可能会劳而无功；英国领事馆和清帝国海关里的英国税务司随时都在玩弄阴谋诡计；法国军人被川渝中国民众痛恨，是因为替愚蠢又自大的英国人背了黑锅，等等。这一切的焦虑背后是一个殖民军人的战略眼光：要让中国西南地区成为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强大后盾，让清朝政府不敢小觑“大法国”的利益。

再次，他对于中国的观察和看法是非常复杂的。

对于清政府的态度，一方面是强盗逻辑：法国炮舰开进中国内河，他觉得理所当然，是“让法国的旗帜飘扬在更远的、他人未曾到过的地方”；各国列强争夺中国内地的采矿权，他认为“这里有一片土壤，在将来会带来巨大的财富，对开发它的欧洲各国是如此，对能参与开发的中国来说，也是如此。再正确不过了”。而且，在成都的义和团风波中，法国领事与成都总督之间的对峙、清朝廷与官员内部的各种矛盾、民众的愤懑和恐惧，都写实地再现了当时风雨飘摇的中国社会场景。另一方面，当他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想法又大不相同：“如果我是中国人，眼看着别人一点一点吞噬自己国家，这种做法我也不能

忍受。”

书中对清朝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也有所刻画，并举证说明：无论是其亲眼所见的清帝国海关完全被英国人所把持，还是道听途说的泸州的盐茶道垄断盐业、抬高税收、买卖官爵，作者言语之中的痛恨和鄙视不难体会。

对于中华文明，他非常清楚自己是一个外来者：“每隔一段距离，就可以看到藏在壁龛里的或是雕刻在整块岩石上的佛像……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是保护神。这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但我们刚刚粗暴地撕开了紧裹着它的面纱；两千年来，中国都沉醉于涅槃般的静止中，但我们用机器和工业，蛮横地赶走了这种宁静，我们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敌人。”

但是，他对于沿途的所见所闻，也有很多令人过目不忘的描写，其间有三峡沿途的绮丽风光；有江岸上绿竹掩映、布满雕像的庙宇；有夔州府码头喧哗热闹的人群；还有成都平原水车精致的结构和有效用途。

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场景，也不乏生动有趣的讲述：礼节上的拜访、坐轿、进门、奉茶、告辞；行船前的拜祭江神；过年过节的热闹和繁琐；语言上的误解和笑料，等等。虽带微讽，还算客观：比如祭拜江神，“在人家的地盘上，合情合理的做法是入乡随俗”，再比如吃中餐，“与人们言传的大不相同，中国菜通常说来也是可以被欧洲宫廷所接受的……著名的皮蛋……确实会散发出轻微的氨水味……但这个味道毕竟不比我们津津有味享用的奶酪更浓烈。”

而且，作者对于民风民俗的记载，使得某些消逝在百年变迁中的画面，重新跃然纸上。针对书中所载川江木船“koa-tse”，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译者最终在清朝学者俞陛云所著《蜀轺诗记》^①中，看到“膀子”一词，他是在1902年入川出任科举主考时，沿岷江而下，乘坐这种客运木船的。时间、地点、木船的形状和用途完全契合，两位百年前的作者就这样于纸墨之间，偶然留下了相互的印证。

^① 俞陛云(1868—1950)，《蜀轺诗记》，上海书店，1986年。

总的来说，作者对于传统中国以及民间智慧怀有尊敬之情，对于近代中国的裹足不前就只有叹息了。比如，说到川江木船的舢， “这些上天的子民们有如此聪明奇巧的构思，没理由不拿来用。而且这也不是欧洲人从他们那儿借用的第一件东西”；说到成都平原的水车，“这个装置简单、省钱，还特别奇巧机动”；说到古代中国的行政区划，“中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极有智慧，反映出古代中国人在行政管理上的聪明才智，但是在他们的不肖子孙那里只剩皮毛了”。

本书的后半部分，对于1902年四川成都地区的动荡局势记述较多，并且，限于其法国军人的身份，也有失偏颇。但是，正是这样一些记录，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满清政府的无能，以及民众所遭受的饥荒、重税，走投无路。这样一个皇权之下闭关自守的近代中国，注定了其悲剧的命运。

书中另外一点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对于几位真实人物的描述。

任何一个时代，哪怕它是最黑暗的，都不缺乏这样的人：他们意志坚定，不知疲倦，不计辛劳，专注于某一件事情，主观也好，客观也好，惠及众人，带来进步，赢得人们的尊敬。在本书中出现了好几个这样的人物。

其一，设立川江红船站的罗总兵，“这一救生机构的组织由来已久，创立人是一位姓罗的总兵，他统领清帝国的长江水师，红船常年展开救生，每年所救性命不计其数。这是我在中国内地所见过的少有的、合情合理、组织有序的事情之一。此话并非恭维。”

其二，作者聘用的中国人左，“他以前是个清朝军官，在重庆指挥过一队中国战舰……有一天，左不知道为什么跟四川总督吵起来了。他解甲归田……实际上这是个可敬而诚实的人……左不管是在江岸人家还是在靠水为生的广大民众中，所到之处都深受爱戴。”

其三，立德乐，首次将轮船开进长江上游，到达重庆的人，同时也是让无数靠水运为生的下层民众惊恐不已，害怕失去生计的人。今天看来，他是长江上游现代航运的探路者。

其四，蒲兰田，一个完完全全的英国籍技术人员，唯一痴迷的就是

航行，他不知疲倦地探索长江上游的航运，应对航行中的一切难题，于川江首设岸标、浮标，培训中国引航员。在武尔士离开之后，仍不改初衷。其辞世后，川人缅怀其功，于新滩立碑，载文：“君之旧友及有志振兴长江上段航业诸人，感君情愫，思君勤劳，醵金刻石，以志不忘。”

然而，在欧洲也好，在中国也好，没有谁能够真正预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改变人类社会的生存规则，改变国家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以现代工业为起点，技术的、科学的、信息的、人文的，各方面的进步随之一步步到来，现代文明势不可当。

废墟为证，铭古喻今；江河奔腾，永不止息。

另附几点翻译说明：

原书在每章的开头，都有一小段内容提要，以类似于关键词的形式出现，翻译中保留了这种表达形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地名的翻译。作为海军军官，航行日志是每日的必修课，所以作者在书中不厌其烦地记录了考察任务中所有的时间和地点。在翻译中，考证地名的时间远远多于正文翻译的时间。本书共收录地名 230 个左右，其中大部分经多方考证，已经核实，但是仍有部分不得不采取音译，可能与实际地名有一定差异，原因如下：（1）作者所采用的注音方式，有规律可循，但并非完全规则，有时候同一个注音指向几个不同的地方，有时反之，同一个地名出现了不同的写法，给翻译造成较大的困惑；在现有可查的资料里，以及更为久远的书籍，如清朝陈登龙所著《蜀水考》^①和俞陛云所著《蜀辘诗记》中，也有不少岷江流域的地名均采用注音的方式，出现了同音字、近音字等。（2）作者所记录的音，很多是当地人的方言，记录和拼写难免有误差，边音 [l] 和鼻音 [n]，平舌音和翘舌音，等等，都比较容易混淆；（3）某些地名，特别是滩涂、江石、村庄等，历史文献鲜有记载，而且现已弃置不用，难以核实。根据以上情况，译者在所有的专有名词第一次出现

^① 陈登龙，生卒不详，《蜀水考》，1800 年成书。